

“我们的镜头，是为人民说话的”

怀念银幕背后的翟俊杰导演

著名导演、编剧翟俊杰因病于2025年12月23日在京逝世，享年84岁。从1986年执导《血战台儿庄》开始，翟导先后三拍长征，还有《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决战》《惊涛骇浪》等等，这些作品已经成为了中国军事电影的经典，并多次获得重要奖项。翟导本人也在2005年获国家人事部和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2023年获得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本期特邀与翟导有过多年交往的江平导演共同回顾纪念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青年时期的翟俊杰



他演戏不是演在脸上，是演到骨头缝里

苏北的冬天，是能咬人的。1978年，我十七岁，那时候我是南通市话剧团的学员，在当地巡回演出。

清晨，泰兴街头，寒气像无数根细密的针，从棉袄的每个缝隙扎进来。我缩着脖子，在东进饭店门口排着队，手里捧着的不是碗，是一只搪瓷脸盆——我天生热情，自告奋勇起了大早去为我们剧团里的老演员们买早点。眼下，就等着这盆黄桥烧饼开餐呢！队伍挪得慢，脚趾头在单薄的解放鞋里冻得发麻。就在这时，背后传来浑厚的一声：“小鬼，端个脸盆，给公家买？”

我回头一看，一位解放军叔叔，“三点红”的军装，风纪扣严严实实，眉眼开阔，正冲我笑。听说我是给剧团的老师们代买，他二话没说，大手一揽，就把我让到了他前面。“先给老同志们买，热乎的才好。”他的北方口音，在湿冷的空气里呵出一团团白气，也呵暖了一个少年局促的心。就这么着，我认识了这位一口一个喊我“小鬼”的“解放军叔叔”。他告诉我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叫翟俊杰，在这里拍一部叫做《黄桥决战》的电影。我兴奋极了，冲他喊了一声：“翟叔，您能带我去看你们拍电影吗？”他一口允应。

我们剧团一般都是晚上演出，白天没什么事。我这就摸到了《黄桥决战》的拍摄现场。翟叔演一个专门和新四军搞摩擦打内战的反动派团长李守维。那天是在一个中学的工地上，人造的硝烟有些呛人。刚才还和颜悦色的翟叔，一听导演喊开机，整个人就“沉”了下去。只见他嘴角一撇，眼风斜扫，那股子骄横跋扈、死硬顽固的劲儿，就从眉梢眼角丝丝缕缕地渗出来。他没怎么大呼小叫，甚至台词都压着些，可那份阴沉，那份手握兵权又困兽犹斗的躁戾，让在一旁屏息观看的我，手心都擦出了汗。我才明白，戏，原来可以这么“演”——不是演在脸上，是演到骨头缝里。

晚上，我们剧团演出，翟叔那边不拍，也摸到我们这儿来了。就坐在第一排。舞台上，我们团的老演员王明承老师，也正演着那

个顽固派团长。散了戏，翟俊杰一个箭步跨上台，紧紧握住王老师的手，一口一个“大哥”，喊得又脆又亮。“您那几步走，那说话的腔调，绝了！我得跟您好好学学！”他神情，哪里像来自电影制片厂的“大演员”，分明就是个见了偶像、掏心掏肺的戏痴。第二天中午，他硬是在东进饭店要了四个小菜，专请王老师。我这个小跟班，竟也荣幸地坐在了那张擦得锃亮的八仙桌旁。

酒是当地的洋河大曲，菜是家常的肉丝炒韭黄、猪肝炒韭黄、腰花炒韭黄，还有一个虾米青菜。他给王老师斟酒，也给我这小毛孩倒上小半杯。几口酒下肚，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到戏曲程式，从角色内心谈到镜头前的分寸。他说话时眼睛里有光，手势翻飞，仿佛那些抽象的理论，都化作了眼前活色生香的画面。他说自己不是什么大演员，就是个“文学编辑”，是“普通一兵”。可那种对艺术近乎本能的狂热与虔诚，像一粒滚烫的种子，“啪”的一声，落在了一个十七岁少年懵懂的心田上。从那天起，“翟叔”这个称呼，在我心里扎了根。

艺术上 他较真得像头犟牛

缘分这东西，一旦缠上，就甩不脱了。后来，我辗转也进了电影圈。1988年，我竟然在遥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与他重逢。

那时，他刚刚随杨光远导演联合拍摄了《血战台儿庄》，自己又独立完成了《长征》。我那时刚当上执行导演，一有空，就爱猫进他那间烟雾缭绕的剪辑房。他正在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共和国不会忘记》做“后期”。

那是艺术最后的、也最残酷的炼狱。翟叔坐在剪辑机前，像一尊凝固的雕像，只有眼睛在闪亮，紧盯着划过画面的每一格胶片。空气里只有“哒、哒”的走片声和他偶尔低沉短促的指令。他和剪辑师吴光灿老师——我的南通同乡，常常争执。为了一个几尺几格的切点，为了一段音乐从何处起，两人能争得面红耳赤。翟叔急了，会“砰”的一拍桌子，脖子上青筋都暴起来；吴老师虽然是女同志，也是执拗性子，寸步不让。那架势，让旁观的

我大气都不敢出。可谁也想不到，一旦出了那间令人窒息的机房，走到厂区外热气腾腾的小酒馆，刚才还剑拔弩张的两个人，立刻换了天地。翟叔大手一挥：“老板娘，炒粉、猪蹄儿，老样子！酒要烈的！”

他举起酒杯猛地干了，然后，一个劲儿地对剪辑师赔不是：“光灿小妹，抱歉，抱歉，我是个粗人儿，性子急容易上火，但搞艺术又是个细巧活，你把关是对的……不过，你也得给我倒一杯酒，刚才你……你还骂我是军阀呢，哈哈。”我在旁边傻眼了。那时候的他，又是那个爽朗爱笑、故事一箩筐的翟叔了。

艺术上，他较真得像头犟牛，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生活里，他却有着孩童般的直率与天真。这奇妙的矛盾，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他的“孩童气”，或许源于骨子里那深沉的孝。拍《我的长征》时，战火纷飞的片场，总能看到一位白发老太太，摇着蒲扇，颤巍巍地跟在翟叔身后。那是他年过八旬的老母亲。儿子指挥千军万马，声如洪钟；一回头看见母亲，立刻腰也弯了，声也柔了，恭恭敬敬一声“娘”，听得人心头发暖。

有一回，正拍一场重头戏，万马齐喑，气氛肃杀。突然，一个苍老而清晰的声音喊：“停——！”全场愕然。只见老太太拄着拐杖，指着监视器，对一脸错愕的儿子说：“儿啊，你看那红军同志，脚上咋穿着塑料凉鞋？这……这不是你常说的‘穿帮’吗？你总说这‘照片’（她总把胶片叫照片）是国家的，金贵，马虎不得呀！”

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老太太把“胶片”说成“照片”，憨直得可爱。可在一片笑声中，我分明看见，我的翟叔，那位在片场说一不二、铁骨铮铮的将军导演，竟红着脸，肩膀微微耸动，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那一刻，铁汉柔情，天地动容。他对艺术的“不容沙子”，连最朴素的母亲都懂了，并成了他最严格的“现场监督”。这“穿帮”，穿帮了塑料凉鞋，却透出了母子间最深沉的懂得与最质朴的守护。

对孙道临谢晋导演等前辈的敬重

这份对长辈的敬，不仅给了母亲，也给了所有他敬重的前辈。电影大师孙道临先生筹拍《詹天佑》，邀他与我，说是“三代同堂”，共谱一曲。翟叔兴奋得像孩子，拉着我去孙先生武康路的家拜访。

孙夫人王文娟老师熬了绿豆汤，用小巧的瓷盅款待。翟叔连喝几盅，咂咂嘴，忽然对王文娟老师笑道：“嫂子，这绿豆汤真好，可您用这肚脐眼儿大的酒盅，喝得不过瘾啊！您把那锅端给我成不？”一屋子的文雅，被他这憨话搅得热气腾腾，孙先生指着他也笑得前仰后合。

一次，孙先生偶然提起北平冬日澡堂的惬意。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翟叔悄悄嘱咐我：“小江平，在上海找找，有没有老式的大池子？”我跑遍老城南区，终于寻着一处。一个冬日午后，我们三代人，叫了辆出租车，真就“赤诚相见”了。氤氲的热气里，三个年龄加起来超过一百五十岁的男人，泡得皮肤发红，聊着

詹天佑，聊着电影，聊着人生。

翟叔感慨：“这真是‘赤诚’相见啊！”而孙先生闭着眼，喟然长叹：“八十岁了，没想到还能这样泡一回大池，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后来电影虽未合作成，但那池热水暖出的情谊，一直流淌着。孙先生仙逝，翟叔连夜乘“红眼”航班飞抵上海，直奔灵堂，在遗像前长拜。那一刻，他不是导演，只是一个痛失尊长、执弟子礼的学生。

对恩师谢晋导演，他同样是这般至情至性。他能将《高山下的花环》的镜头背下来，分析得丝丝入扣。谢导说他是知音。谢导走后，追悼会上人山人海，翟叔见我张罗着忙乎，二话不说就帮忙维持秩序，忙前忙后，汗水涔涔，不知情的，还真以为穿着迷彩服军装的他，是殡仪馆的保安。这就是他，从未把自己当什么“人物”，在老百姓中间，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兵。

“我们的镜头，生来就是为人民说话的”

他拍《我的法兰西岁月》，为了捕捉川东神韵，钻进村里，一住就是多月。

掀老乡的锅盖，看米缸还有多少粮；坐在门槛上，一晌午就听老人“摆龙门阵”。演员台词带了几化音，他急得跺脚：“这是南方！要说‘我们’，不是‘咱们’！”道具拿来青花细瓷碗，他眼睛一瞪：“乡野小店，哪来这么精细的东西？换陶碗！”记住，不要黑陶，那是北方的！“草木皆兵，细节皆戏。他说：“艺术这东西，哄不了人。你心里没有人民，镜头里就装不下江山。”

他最爱陈毅元帅的诗：“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他说，这不是口号，是他的来时路。18岁，他就在修筑青藏公路的部队文工团里，用冻僵的手打快板，鼓舞士气。生死高原，冰河铁马，是人民用最质朴的信念滋养了他艺术的根。

后来他虽考入高等学府，身居要职，但底色从未变过。他病重的时候，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老艺术家的回信，对“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这两句话反复咀嚼，他说：“我们这辈人，就该这样。因为我们的笔、我们的镜头，生来就是为人民说话的。”

如今，翟叔已远去。可是闭上眼，我总看见两个画面交替浮现：一个是泰兴寒冬，那个把陌生少年让到身前的绿色身影；另一个，是剪辑房里，为了一格胶片与同事争得面红耳赤，而后嘻嘻哈哈去吃炒粉的“老男孩”。前者是仁厚，后者是赤诚；前者关乎做人，后者关乎艺术。而贯穿其中的，是他对土地、对人民、对艺术那份近乎笨拙的、滚烫的虔诚。

据《北京青年报》

文并供图/江平（作者为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中影集团一级导演）



2000年，翟导为电影基金会四位常务理事绘制头像（右起张良、翟俊杰、马精武、江平）